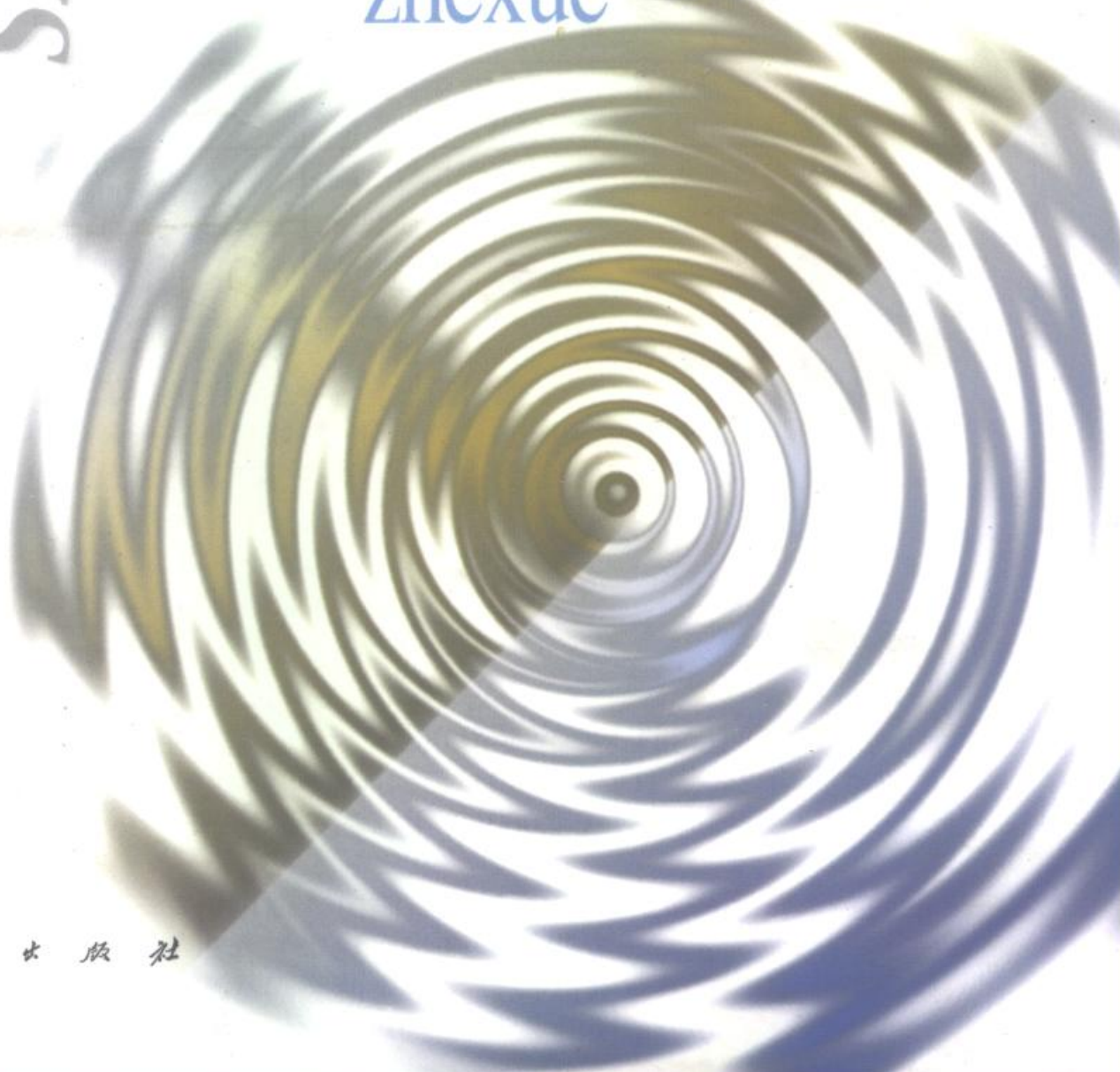




21<sup>ST</sup> CENTURY  
面向 21 世纪 课程 教材

TEXTBOOK  
SERIES

新编  
现代西方哲学  
Xinbian xiandai xifang  
zhexue 刘放桐等 编著



人民出版社

#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刘放桐等 编著

1983年11月第1版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亚明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赵迎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等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

ISBN 7-01-003123-1

I. 新…

II. 刘…

III. 哲学-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08175号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XIN BIAN XIANDAI XIFANG ZHEXUE

刘放桐等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46.5

字数:823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01-003123-1/B·254 定价:48.80元

# 序 言

本书是在《现代西方哲学》1981年初版、特别是1990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而成的,可以看做是该书的第三版。这次修订的重点是力图进一步摆脱“左”的思想影响,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从整体上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由于这个新的版本在指导思想上与初版和修订本都有所不同,为了与之区分开来,我们将其改名为《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新编》与初版及修订本当然有连续性,但又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目标。初版的主旨是从无到有,初步搭出本学科的理论框架。修订本力图对在“左”的影响下形成的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方式多少有些突破,使本学科的研究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新编》除了进一步探讨如何使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评价更加符合实际外,更着力于探讨如何促使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新阶段。《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版本大概可以代表我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我个人尚能力图使自己的研究紧跟我国本学科研究的步伐,那么本书的这三个版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多少体现近20年来我国本学科研究的轨迹。为了与读者及同行专家一道来总结这一时期我国本学科研究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研究能更好地适应我国哲学研究以至整个思想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我想在此简单回顾编写和修订本书这三个版本的历程。

## 一、从无到有,重建学科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又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新学科。

说其悠久,是因为它早在清朝末年就已被一些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所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所输入的新思潮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大都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早期流派(如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解放前我国各大学讲授的西方哲学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许多老一辈哲学家往往是对这些哲学有很深造诣的专家。

说其年轻,是因为我国原有这方面的研究大都较为零碎和一般化,未形成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从50年代初起的20多年内,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现代西方哲学被当做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极少有人再愿意涉足,原有人员也大多被迫转向哲学史等其他领域。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及为批判的目的而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极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各大学哲学系均不系统开设本学科课程(记得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几位著名专家曾作过几次专题介绍,但不久也许是由于政治原因停讲)。本学科的研究实际上被中断了。一直到“十年动乱”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界的同行们才有机会重新思索有关本学科的问题,并探讨如何将其重建。由于原有基础极为薄弱,形成了事实上的空白局面,本学科的重建实际上是从无到有的新建。

就我个人来说,参与这一重建既具有一定有利条件,又经受了重重困难。

我195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作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1961年初到复旦大学工作后不久,就在全增嘏教授的鼓励 and 指导下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当时他正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讲授现代西方哲学。尽管讲的内容很是简单,但作为独立的课程开设在国内大概是仅有的。他让我给学生作辅导,一个学期后由我接替他承担整个课程的教学。在那以后的近4年内,我虽然还担任了许多其他工作,但主要精力是从事本学科研究。由于“左”的倾向变本加厉,从事本学科研究在政治上要承担较大风险,又由于当时本学科研究在国内处于停顿状态,可供参考借鉴的材料奇缺,更无这方面的学术讨论,我在研究中处处感到困难。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到1964年,课程的开设已较完整,编写出了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相当一部分流派的讲义。如果能再坚持2—3年,我大概可以编写出一本水平虽不会高、但仍较系统的教材来。怎奈不久国内政局剧变,我的教学和科研都被迫中止;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原已写成的书稿和收集的材料很大一部分也在一片恐怖声中被丢失了。然而这几年的工作没有白费。已作过的工作在我头脑中毕竟留下了较深的痕迹,更重要的是那几年的艰辛对我的意志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我自知学术根底浅薄,智力平庸,仅仅凭着这点较为倔强的意志,才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这很是加强了我对自己的信念。

正因为如此,当文革结束,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开始显露希望的曙光时,我就重新产生了编写一部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教材的意念。我对面临的困难有充分估计。尽管一些同行已在开始介绍某些哲学派别或者编译有关资料,对我很有帮助,但毕竟都还处于初始状态,还很难据之编写教材;至于对各个哲学流派如何评价,哲学界还远未具体探讨。因此一些朋友不无理由地提出要编写本学科教材至少要再准备5—6年。当我编写教材的打算传出后,有些好心的朋友劝我知难

而退。然而当时本学科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大家对它的基本内容还缺乏了解，各院校哲学专业大都计划开设本学科课程，却又苦于找不到关于它的基本理论框架的材料。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成了本学科重建中的首要问题，而编写一部能提出本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它的主要内容的教材或论著，又是解决从无到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因此更多的朋友鼓励我利用较早涉足这一学科、有一定基础这一有利条件，承担此项任务。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心迎难而上，在学科重建的关键时刻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一些同志的参与和帮助下，在国家教育部和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现代西方哲学》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也许由于它是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本学科第一部较系统的教材，适应了学科重建的急需，尽管它很不完善，仍然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一些报刊甚至把它当做我国本学科重建的开创性事件之一。在往后许多年内，它一直被多数兄弟院校采用，到1989年为止印刷了十多万册，多出同类教材许多倍，并多次在不同场合获奖。不过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不是这些奖励，而是许多年轻同志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他们都曾看过这部书，甚至是在其激发下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这表明本书在本学科的重建中起到了预期的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然，本书所取得的一定的成功并不证明我个人在本学科研究上有多高的造诣。我自认在这方面不仅远逊于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也不如近年来涌现出的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在同辈同行中，我也只能算是中庸之辈。如果说我在本学科的重建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主要是由于我对自己的所为有坚强的信念，能勇于克服困难，敢冒风险。

## 二、循序渐进，突破旧的哲学思维和评价模式

《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版固然受到广泛欢迎，但它又存在很大缺陷：它对有些哲学流派的介绍不够具体和细致，偏离了它们本身的思想逻辑，往往把它们理论纳入世界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方法论等预设的理论框架中，这必然产生削足适履之弊，从而必然存在不够准确和错误之处；对它们的评价虽与“左”的一套有所不同，但并未摆脱旧的批判模式。对这种缺陷我们在本书出版以前就有所知，但感到暂时还难以克服；出版后专家和读者们自然会觉察，但大家似乎都以初创时期难以避免而表示谅解。

我们当时之不能克服上述缺陷，除了自己的学术根基不实外，最主要的是：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摆脱传统的哲学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介模式的确必需

改变,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它们作具体分析。但这一点说来容易作来难。因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僵化了,用之来指导西方哲学研究和对之作出评价,往往意味着把后者纳入某种固定的理论框架中并作出是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当时谁都难于作出准确回答。有的朋友因此建议我干脆不与马克思主义挂钩,只要把西方各派哲学理论如实介绍就可以了。我未敢这样做。这一方面是由于我认为在中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是担心在政治上引出麻烦。毕竟当时“左”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相当强大。如果在这本可能流传较广的教科书中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文字,很可能被指责为放弃和违背马克思主义,而这势必对我国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产生损害。于是我基本上仍采用了被普遍认可的批判模式。只是在这个限度内尽可能多作客观介绍,在较有把握的地方作些肯定。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我的顾虑不是多余的。本书的出版固然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却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安。他们仍然觉得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这方面的论著只能作为供批判的内部材料。将其公开出版、甚至成为畅销书,必然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某些权威部门也一度把本书当做传播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典型之一通报全国。这不仅对我个人形成了沉重压力,也使哲学界的许多人士感到震惊。因为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处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它的主要缺陷之一正在于没有摆脱“左”的批判框架。如果这样的书被判定为宣扬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那末又怎么能谈得到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研究呢?不过这场风波持续时间不长,不久就雨过天晴了。

本书之受到广泛欢迎以及它所经受的政治风波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国本学科在 80 年代上半期的状况:它已乘改革开放之风重新建立,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能摆脱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哲学思维框架和评价(批判)模式,或者说突破这种框架和模式的努力有时还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和阻力。而且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也越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因此在作出这种努力时必需小心谨慎,不能操之过急。不过改革开放毕竟已是我国社会的主流,突破旧的哲学思维框架和批判模式也必将成为我国哲学研究、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可逆转的方向。尽管在我们遇到的这场政治风波过去后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还遇到过其他一些困难,但总的说来越来越走上了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现当代西方哲学名著被成批翻译出版,我国学者撰写的本学科论著(包括不同规格的教材)大量问世,其中不少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上已有重大进步。

我们的《现代西方哲学》尽管在学科初创期起过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它毕竟

只能体现 80 年代初期的研究水平。随着本学科研究后来的发展和进步,它必然会越来越显得过时。对此,我们在本书出版之初就有清醒的认识。我一直把如何克服或减轻初版中存在的缺陷,密切注视、概括、体现和促进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使这部教材在学科发展的新阶段中能发挥新的作用,当做自己的努力方向。从 1984 年起,我就在酝酿如何对本书进行修订,1988 年修订完成,1990 年出版了修订本。为了使修订达到预期的目标,我和其他参写者一道对各个流派的原始材料重新进行研究,借鉴了国内外的近期研究成果,力图对各派理论作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介绍,我们补充了一些新流派,原有流派也大都改写了。在突破旧的批判模式上我们也作了较多努力。例如不单以唯物唯心来为各派哲学划界和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我们实际上已提出了与初版大不相同的看法。例如肯定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许多进步,肯定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的同一性。不过,由于这些问题带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还不充分,因此修订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不是很明朗、透彻。尽管如此,与初版相比,修订本在论述的科学性和评价的客观性方面都有较大提高。90 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有关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论著相对受到冷落,然而修订本自出版以来印数仍是同类教材的许多倍。根据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调查,大部分兄弟院校仍然以本书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这至少说明它依然受到读者的欢迎,这对我们既是鼓舞,更是鞭策。

### 三、迈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最近几年来,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左”的意识形态的干预已越来越少,自由探讨的宽松局面已开始形成。在哲学研究中因提出不同见解而在政治上遇到麻烦的情况已未再有所闻。我国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由此取得了重要进步。就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来说,尽管不再有 80 年代那种泡沫性的热潮,但深入具体的研究之作比那时要多得多。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特别是一批年轻哲学家的迅速成长,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大为提高,对现象学等个别领域的研究甚至已近乎可与国外媲美。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克服了以往那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偏见,自己也在这方面作认真的研究。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解释学等流派中的一些术语现在也经常出现于他们的论著中。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趋势已渐渐地可见端倪。

然而这也还只是一种较为朦胧的趋势。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虽有丰硕成



果,但还未充分运用于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后二者仍处于分离状态。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行们为了避免各种烦扰,大都宁肯局限于本学科理论层面的研究,不愿多涉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已在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但多半不愿直接提及后者。他们在这方面显然还存在疑虑,对过去这方面的粗暴批判仍心有余悸。至于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现在已不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但也许是由于对后者缺乏了解,他们的研究大都与后者脱节。

总的说来,从社会大环境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状况来说,现在已具备了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大家都认识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而为了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就需要重新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如何从整体上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它之取代近代西方哲学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呢还是只是局部性的变化、甚至倒退?它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有何联系?彼此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上是殊途同归呢还是仅仅根本对立?如果是后一种回答,那自然谈不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问题;如果是前一种回答,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的。哲学界过去早就以某种较为笼统和间接的方式提出过,并进行过一些讨论。只是因为那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大都是按照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理解的,加上这些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因而对它们的探讨往往失于一般化和抽象化,未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现在我国的社会大环境已发生重要变化,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也都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理解,因而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以更直接的方式重新提出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新的探索。如果能通过这种探索在哲学界达成共识,将会把我国的哲学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个人一直主张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应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相结合,因而也一直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思索。上面提到,《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对这些问题实际上已有所涉及,提出了一些与初版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看法并未作充分的论证,也未明确而全面地将其运用于分析和评价各个具体的西方哲学流派。对有些哲学流派的评价可谓已具有新意,对另一些哲学流派的评价仍然未摆脱旧的评价模式。这说明修订本在对各派哲学的评价上存在内在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还是新旧哲学思维和评价方式交织的产物。

《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从1990年问世至今已有十年。尽管在书市上它一直

热销,但与十年来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相比就显得陈旧了。更重要的是:它已不适应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推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个新阶段的要求。因此早在几年前,我已酝酿着对它进行新的修订。这次修订的内容当然也包括进一步克服1990年修订本中仍然存在的对各派哲学介绍中的片面、不实和错误之处;并吸取哲学界最近十年来对本学科研究的成果,适当增补一些新的内容,使这部教材对现代西方哲学有更加准确和全面的介绍。但更重要的是纠正它的指导思想,克服它在对各派哲学的评价上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意味着要对上述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将其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具体说来,新的修订本,即《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将主要贯彻如下两个基本观点:西方现代哲学取代近代哲学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使西方哲学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转型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上二者殊途同归,二者都属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这种观点与传统的观点显然大不相同。从外表上看,它似乎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但我们认为它更好地贯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在《新编》正式出版前就指导思想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近几年来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论述。其中《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3期)对这些观点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证。本文经《新华文摘》转载,在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应。有些朋友明确表示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哲学家)则表示赞同。

尽管哲学界在回答上述重大问题上有明显差异,但我个人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当、而且必将进入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新阶段,反之亦然。在前进的过程中还会出现曲折,还会出现新问题,但我深信这一前进的方向不会逆转。我个人近几年研究的主要目标都是力图对推动和加速这一过程起一定的促进作用。我自知还将会遇到不少困难,甚至可能要承担某些风险,但我乐此不疲,义无反顾。

最后,我想就《新编》的内容增删变化、章节安排以及编写分工等情况作些说明。

《新编》较多地利用了1990年修订本的原有基础,但对各个哲学流派的内容的评介大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增删变动,特别是对那些并非必要的评论性文字作了较多压缩,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其中“绪论”是完全重新编写的。它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新编》的基本观点。克尔凯郭尔哲学在修订本中作为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放在存在主义一章,这次将它与叔本华、尼采哲学放在一起作为第二章“非理

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以期有利于说明 19 世纪中期西方哲学所发生的转型性的变更。宗教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初版和修订本专设了“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两章。考虑到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内容远比这两个流派广泛，这次我们新设了“现代西方宗教哲学”专章，除了将原来的两章压缩成三节列入外，还介绍了现代西方其他一些宗教哲学派别。本书初版设有“法兰克福学派”专章。1990 年出修订本时考虑到有的教学单位已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开设，取消了这一章，另设了“弗洛伊德主义”专章。近几年，不断有同行朋友反映，他们那里没有条件单独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仍是放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讲授，因此建议我们恢复收入。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重新设置了“法兰克福学派”专章。卡西尔的哲学近些年来在哲学界经常被谈论。他后期的思想、特别是人类文化哲学显然已超越新康德主义范围。这次我们补写了关于他的内容，与原有的“哲学人类学”一章合并为“哲学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哲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较有影响的一个流派，一些专家和读者建议将本章加强。我们原来打算完全重写，因种种原因仅重写了其中第一、八、九节。因此这一章仍显得较弱，这只有等以后补救了。后现代主义近些年成了我国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它并非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往往分属于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派别，他们的哲学观点差异很大，加上多数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已在有关章节中作了介绍，因此不宜再设专章。但后现代主义毕竟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被不同的哲学流派所谈论，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现代西方不同哲学流派都存在的一种超越它们原有哲学的局限性的一种倾向。因此决定在本书最后设一章来讨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并在其中评介后现代主义。

尚在本书出修订本时，一些专家就提出，作为教材，本书篇幅太大，建议压缩。但另一些专家提出，鉴于现今简明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很多，但材料丰富、可供教师和研究生参考的教材少见，因此建议不必压缩。我们采用了后一建议。从修订本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欢迎的情况看，当时的决定似乎是对的。在《新编》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基本方针是大体保持原有篇幅。为了增加一些新内容、特别是体现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评介的内容，我们对一些较旧的、或者大家都较熟悉的哲学流派的介绍作了较多压缩。但总的篇幅仍较大，对于那些课时较少的单位，更显得过繁。我们还是像出修订本时那样设想，愿意采用本书作教材、但又嫌其过繁的单位，不妨请教师指定只阅读其中的某些部分。

另外，我们估计会有一些专家和读者可能不会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作为《新编》指导思想的某些观点。为了便于抱不同观点的读者都能利用本书，我们把

对这些观点的论述集中在本书“绪论”及第二十章“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后现代主义”中。在评介各个具体哲学流派的其他各章中,这些观点虽然也会应用;但我们注意尽可能不让它们影响对各派哲学的理论的评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新编》编写分工的情况如下:

原来参加《修订本》编写的陈奎德和欧阳光伟先生、李莉女士已定居在国外多年,他们各自忙于其他工作,故这次修订没有请他们参加。原来分别由李莉女士和欧阳光伟先生撰写的“生命哲学”和“哲学人类学”,这次都由我自己作了修订和增补;原来由陈奎德先生撰写的“分析哲学”这次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江怡先生重新改写了。无论这次是修订还是重写,陈奎德等先生原来的工作都是很有价值的,为这次修订或重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新编》编写的其他成员有:黄颂杰(复旦大学):第八章(20世纪的实在主义思潮);张庆熊(复旦大学):第十一章(现象学);尹大贻、余碧平(复旦大学):第十四章(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第2—9节;陈学明(复旦大学):第十五、十六章(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张汝伦(复旦大学):第十七章(哲学释义学);张之沧(南京师范大学):第十八章(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王珉(浙江师范大学):第十九章第五节(蒂里希与新正统主义神学)。

其余章节都是由我自己撰写或修订的。

由于有多位同行参与编写,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弥补了我个人知识的不足。这对完成《新编》的编写起了重要作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多人执笔必然带来理论观点和文字风格不统一等缺陷,这在初版和修订本中都较多存在,一些读者对此提出了意见。为了尽可能减少这方面的缺陷,我在这次统稿时对各章节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调整,个别章节动得还较多。如有不当之处,都应当由我负责。

从《新编》开始编写时起,我一直和人民出版社保持联系,责任编辑陈亚明女士就本书编写中各方面的问题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本书被国家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被上海市教委列入“九五”重点教材计划并给予了资助,复旦大学教务处的同志也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刘放桐

1999年5月

# 绪 论

“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有着多种含义的概念。广义地说,它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包括产生于西方并在西方各国流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有着本质区别,它在我国被当做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在哲学教学的课程体系中一直作为主导课程单独开设,不再包含在“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中。本书准备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同一现代哲学背景下加以分析和介绍,并试图对西方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作出一些新的解释,但又不准备在此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

现代西方哲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形成和发展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理论形态,我国哲学界过去由此称其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有一些西方思想家提到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但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哲学也具有超越作为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内涵。因此如果把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和绝对化,也会脱离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不能对其作出正确解释。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现在大都不把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地叫做资产阶级哲学,而较笼统地称其为西方哲学。本书也作这样处理。

对现代西方哲学所涉及的时间界限,哲学界也没有统一看法。本书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泛指 19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各国产生和流传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主要是考虑到 19 世纪中期是西方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基本理论特征和发展倾向(或者说思维方式)说,在此以后的哲学越来越变得与在此以前的哲学、特别是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大不相同。为了把二者区分开来,我们把在此以后的西方哲学都归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之内。

## 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

### 1. 西方哲学发展的现代转折的意义

不同倾向的哲学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评价往往大不相同,但他们都

会承认,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区别。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近现代之间发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转向、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根据对西方社会和哲学发展史的深刻分析,揭示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也对传统欧洲哲学采取批判态度,要求对之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并纷纷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从那时以来,哲学上的各种转向(例如语言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等等)之声不绝于耳,它们的意义往往有重要区别,也往往有得以成立的理由。究竟何种“转向”更加深刻、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变更,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极不相同的回答,在西方哲学家内部也往往难于达成共识。

但是,在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改变哲学发展方向上,在对哲学问题的提法和回答上,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共同之处。正是后者把西方现代哲学和近代等古典哲学区分开来,从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新转折的主要标志。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有较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当然需要对各家各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它们各自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但也应研究它们的共同之处,特别是那些使它们与近代等古典哲学区别开来的特征。这也就是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古典”)向“现代”的转化在整个哲学发展上所具有的真实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较为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顶点的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我国哲学界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大都抱着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相当流行的看法上:第一,认为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反映了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时期、具有一定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求的合理和积极的因素,而自此以后的西方哲学则主要是作为已失去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无非是为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和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利益和要求作辩护,从本质上说不可能包含合理和积极因素,在理论上表现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第二,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克服了以往西方哲学的种种缺陷,继承和发扬了其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并由此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真正的革命变更,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现代西方哲学恰恰相反,它们抛弃了西方哲学的优秀遗产和进步传统,而发挥了其消极、落后以至反动的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

这两种看法密切相关、互为表里。它们不是凭空提出的。人们无论从理论上

或历史现实上都可以为其找到印证的理由。问题是：这些理由是否充分和具有普遍意义。在“左”倾教条主义支配的时代，人们很少、实际上也难于对之提出疑问。

随着“左”倾教条主义得到清算和克服，人们开始重新研究、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也在对一些过去几乎被认为无容置疑的结论重新加以研究。现在已很少有人再简单支持上述看法。越来越多的人从原则上肯定西方现代哲学同西方近代哲学一样存在着合理和积极因素，有的人还企图把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与对中国传统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然而，如果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所具有的真实意义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习惯了的那种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就不能真正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进步和革命含义，从而也不能如实地认识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

为了了解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意义，首先就需要分析和研究近代西方哲学的成败得失。

## 2. 西方哲学在近代的转折和进步

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从多姿多彩的古希腊罗马转向神学一统天下的中世纪曾被比喻为从白昼进入黑夜，那末从中世纪转向“文艺复兴”则被当做开始了新的黎明。的确，对于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的近代西方哲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它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上所处的重要地位，除了个别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外，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不同，人们对这一时期哲学的评价和取舍标准在某些方面必有差异，但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所具有的人文和科学精神的进步意义，他们大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这一时期欧洲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当时的许多先进思想家，对作为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贬低理性和抬高信仰为特征的传统宗教和神学以及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并论证和讴歌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特别是人文主义者）就已把具有理性的人当做他们关注的中心，把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促进人性的解放当做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他们号召人们冲破传统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禁锢，把注意力由彼岸的天国返回到现实的人间。在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各种派别的分野，但各派在提倡理性、限制信仰上有着很大一致。笛卡尔运用其所制定的理性演绎法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固然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理性主义体系，培根等人的经验主义也同样以尊重和颂扬人本身所具

有的认识能力,即与盲目的信仰相对立意义下的理性为前提。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 and 启蒙主义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原则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都把理性当做是人的本质,并把是否符合理性当做衡量是非善恶甚至美丑的根本尺度。康德揭示和批判了他以前的哲学家由于停留于理论理性(认识和科学领域)所必然陷入的矛盾,但他企图通过论证人具有先验认识能力来克服这种矛盾,以此使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得到确证;同时他又把理性由科学所属的理论领域扩展到道德自由所属的实践领域,扩大了理性的作用范围。他关于限制理性、为信仰留下地盘的口号的真实含义也正在限制理论理性的作用范围,肯定与之不同的实践理性,而不是排斥理性和倒向传统意义的信仰主义。黑格尔在揭露和批判包括康德在内的前人的理性主义的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主义体系。正因为如此,整个这一历史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的体现的理性主义精神与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科学精神是互为表里、彼此促进的。当时的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从神学以及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家们已不再援引神力(天启)去洞悟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去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当时先后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这种认识和研究的结果有时达到了可以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的程度。哥白尼、刻卜勒、伽里略和牛顿这些科学大师的发现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光辉的范例。自然科学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桎梏下的这种解放促进了哲学获得同样的解放。哲学已不再像在中世纪那样是神学的婢女,而是人本身的意识、即理性的产儿。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凡人所需要了解的一切均可通过人本身的理性获得像数学推理一样清晰和精确的理解。总之,自然科学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理性的胜利。

近代西方哲学在从当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获得其所需的论据和知识材料的同时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导。这具体表现在它们对实验自然科学的成果从哲学上作了总结和概括,不仅以之为基础而重新提出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更为自然科学以及人的全部现实生活制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这对自然科学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正是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典范。他们以后的许多哲学家,特别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作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论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认识的辩证法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论述。康德对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成



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可谓集古典西方哲学的辩证法的大成。

这种在实验自然科学基础上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深入和具体的研究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已普遍地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反省思维的基础上,从而克服了古代哲学所特有的素朴性和直观性。这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发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折的重要的转折,使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当时的哲学家仍把世界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哲学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当做关注的核心,但他们的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已与建立在感性直观和猜测基础上的古代哲学以及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与上帝的关系,并使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世纪哲学有着重要区别。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即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关系问题。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虽然早已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sup>①</sup>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是理性反思。这就是为什么由认识论转向所开辟的哲学的新时代被称为理性(或者说反思)的时代。

### 3. 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

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光辉夺目的进步时,即已包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由此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上帝万能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主义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表现为,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虽然以反省(理性)思维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然而它之以主客、心物等分离为前提又往往使人忽视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

当欧洲人从中世纪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先进的思想家们纷纷拨开神学的迷雾,重新开始探索古代先哲们即已提出并进行过较为笼统的研究的关于现实世界的本质、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等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文艺复兴时代,哲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4页。